

建筑史解码人



杨永生

王莉慧

编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建筑史解码人

杨永生 王莉慧 编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建筑史解码人 / 杨永生等编.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6

ISBN 7-112-08291-9

I. 建... II. 杨... III. 建筑史 - 中国 IV. TU-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0580 号

责任编辑: 王莉慧 何 楠

责任设计: 董建平

责任校对: 张景秋 孙 爽

建筑史解码人

杨永生 王莉慧 编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经销

伊诺丽杰设计室制版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26¼ 字数: 500 千字

2006 年 6 月第一版 2006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56.00 元

ISBN 7-112-08291-9

(14245)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本社网址: <http://www.cabp.com.cn>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building.com.cn>

编者的话

中国建筑史发展到今天，离不开几代建筑史学人近百年来的不懈努力。第一代学人朱启钤创建了中国营造学社，启动了中国古代营建历史的研究工作。在他的引导下，梁思成、刘敦桢两位学界前辈将现代科学方法引入了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建立了调查、研究的科学体系，他们带领一代学人对我国的历史建筑遗存进行了实地测绘与研究，写出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报告，为中国建筑史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当时，在营造学社人力、物力、财力极度缺乏的情况下，取得了前无古人的非凡成就。其后，第二代学人如刘致平、单士元、陈明达、莫宗江、卢绳、罗哲文等，是第一代学人的追随者和协助者，也是继梁、刘之后我国卓越的建筑史学家。他们是营造学社的中坚力量，在梁思成、刘敦桢两位学者的培育和影响下，直接协助二位前辈进行中国建筑史的调查研究工作，为中国建筑史学科的确立和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与保护，做了大量的工作。第三代学人，如傅熹年、王世仁、杨鸿勋、潘谷西、郭湖生、侯幼彬、汉宝德等，在人数上远远多于第一代、第二代学人，他们同样继承了前两代学人的研究精神，一生都在建筑史领域辛勤耕耘，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不乏当今建筑史学界的权威人物。他们中间，有些学者已从一些新的角度，尝试对中国建筑历史作进一步的诠释。第四代学人，如王贵祥、李乾朗、王其亨、方拥、张十庆、陈薇、常青等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学者，他们的研究条件远远好于前辈学者，并大多经历过国外的学习，能从世界的角度、从中西建筑的比较来看待中国古代建筑，现今都是建筑史研究和教学领域的中坚力量。

在几代建筑史学人的努力下，中国建筑史学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完备的学科体系，在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各个领域，如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近代建筑史、中国园林史、中国城市史和中国民居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建筑史学的发展和弘扬我国传统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为了

使建筑史学科后继有人，对未来的学子能起到指引的作用，并向广大读者，特别是为年轻的建筑史研究人员和建筑历史与理论专业的学生提供一份概括性地介绍中国建筑史学研究者的经历及其学术成果，我们编辑了这本《建筑史解码人》。

相对于中国建筑史的研究队伍而言，我国研究外国建筑史的学者人数要少得多。但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也出现了一些知名的专家学者，如汪坦、罗小未、陈志华、吴焕加、刘先觉等，他们长期致力于建筑理论、外国建筑历史的教学与研究，对于活跃我国的建筑设计思想以及建筑教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本书选入的是以上几代在建筑史研究领域具有建树的专家学者以及一批年轻有为并具有潜力的中青年专家学者。当然，他们只是整个建筑历史研究队伍中的一部分代表人物。还有很多对建筑史研究事业作出贡献的、默默无闻的学者，限于本书篇幅及编者视野范围，难免挂一漏万，这一点尚请谅解。

本书力求以简明的文字对每位学者的经历、已发表的主要著作、主要学术观点加以阐述。约稿时我们提出，可以是本人撰写，也可以请别人撰写。来稿当中有些是由本人所写，有些则为别人所写。对于一些来稿，在征得撰稿人同意的前提下，我们本着力求客观求实的原则，作了适当的删减和修改；也有一部分稿件本着文责自负的原则，尊重了撰稿人的意见，将原稿呈现给读者。

我们期盼有更多的年轻学者来关心和研究我国和世界各国的建筑史，涌现出更多的成果，因为建筑历史的研究需要传承。

杨永生 王莉慧

2006 年 4 月 8 日

目 录

1 朱启钤 (1872-1964)	110 张良皋 (1923-)
8 刘敦桢 (1897-1968)	115 罗哲文 (1924-)
16 童 寓 (1900-1983)	123 罗小未 (1925-)
23 梁思成 (1901-1972)	125 张驭寰 (1926-)
29 龙庆忠 (1903-1996)	130 张似赞 (1927-)
33 林徽因 (1904-1955)	135 潘谷西 (1928-)
39 单士元 (1907-1998)	141 高介华 (1928-)
47 王璞子 (1909-1988)	147 陈志华 (1929-)
53 刘致平 (1909-1995)	149 吴焕加 (1929-)
60 陈明达 (1914-1997)	150 王其明 (1929-)
64 贺业钜 (1914-1996)	156 陆元鼎 (1929-)
68 杜仙洲 (1915-)	161 楼庆西 (1930-)
70 汪 坦 (1916-2001)	166 徐伯安 (1931-2002)
75 莫宗江 (1916-1999)	171 郭湖生 (1931-)
81 卢 绳 (1918-1977)	174 杨鸿勋 (1931-)
89 冯建達 (1918-)	180 刘先觉 (1931-)
93 陈从周 (1918-2000)	185 刘叙杰 (1931-)
98 于倬云 (1918-2004)	191 侯幼彬 (1932-)
103 祁英涛 (1923-1988)	196 喻维国 (1932-)

- | | | | |
|-----|--------------|-----|--------------|
| 204 | 傅熹年 (1933-) | 307 | 张复合 (1947-) |
| 210 | 孙大章 (1933-) | 314 | 李乾朗 (1949-) |
| 214 | 王世仁 (1934-) | 322 | 王贵祥 (1950-) |
| 219 | 汉宝德 (1934-) | 329 | 钟晓青 (1951-) |
| 225 | 赵立瀛 (1934-) | 335 | 方 拥 (1953-) |
| 229 | 杨乃济 (1934-) | 342 | 陈同滨 (1953-) |
| 234 | 曹 汛 (1935-) | 348 | 朱永春 (1953-) |
| 240 | 柴泽俊 (1935-) | 354 | 刘松茯 (1954-) |
| 246 | 路秉杰 (1935-) | 359 | 刘临安 (1955-) |
| 252 | 邓其生 (1935-) | 364 | 刘大平 (1955-) |
| 257 | 郭黛姮 (1936-) | 370 | 柳 肃 (1956-) |
| 262 | 于振生 (1936-) | 375 | 傅朝卿 (1957-) |
| 265 | 萧 默 (1938-) | 380 | 杨昌鸣 (1957-) |
| 271 | 邹德侗 (1938-) | 385 | 常 青 (1957-) |
| 277 | 杜顺宝 (1938-) | 390 | 赵 辰 (1957-) |
| 280 | 陶友松 (1938-) | 394 | 程建军 (1957-) |
| 287 | 郑时龄 (1941-) | 400 | 张十庆 (1959-) |
| 293 | 朱光亚 (1942-) | 404 | 陈 薇 (1961-) |
| 297 | 杨秉德 (1944-) | 409 | 赖德霖 (1962-) |
| 302 | 吴庆洲 (1945-) | | |

朱启铃

(1872-1964)



紫江朱桂辛先生启铃是原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毕生在提倡和指导研究中国传统工程技术和工艺、阐扬古代优秀科技和文化成就上作出了多方面的、重大的贡献。1918年他发现了宋李诫编《营造法式》钞本，即于次年影印行世；他又精心收集了一系列古代织绣的代表性作品，于1923年自撰《存素堂丝绣录》行世；又把国内已佚而在日本尚有钞本留传的明黄成撰《髹饰录》于1927年刊版行世；最后，他于1930年创立了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由于他的社会威望、学术地位，特别是热心倡率，得到学术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先后使古代建筑、古代织绣工艺、古代漆工艺这三项日趋衰落的领域重新得到关注和重视，为振兴我国重要的传统文化和工艺作出了导向性、开创性的贡献。今年适逢先生逝世40周年，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和贵州省开阳县政府联合举办《朱启铃学术研讨会》，缅怀并阐扬他在学术上作出的多方面的贡献，是非常有意义的。作为先生的世交晚辈和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后学，通过在他倡导和指引的道路上做一点工作，使我深深感到先生开创这门学科的重要意义，对他保护和阐扬祖国文化遗产的热情、高度责任感和他在学术上的远见卓识非常钦敬。

把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作为一项专门学术，并建立在现代建筑学、美术史学和文献学的基础上，中外学术界公认是自中国营造学社始，也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而中国营造学社正是朱桂辛先生创立并自任社长的。桂辛先生对营造学社工作的卓越领导主要体现在他制定研究工作的指导方针和选拔优秀人才两个方面，而这正是一位杰出领导人的最重要的品质和最关键的工作。

桂辛先生对营造学社工作方向的指导方针主要体现在1929年3月24日所著《营造学社缘起》和1930年2月16日所作的《营造学社开会词》中。



1 我曾见到王世襄先生过
录的桂辛先生在《营造法式》
上的批注。

在《开会词》中，他提出“因全部营造史之寻求，而益感于全部文化史之必须作一鸟瞰。……研求营造学，非通全部文化史不可，而欲通文化史，非研求实质之营造不可。”把研究中国营造史（即建筑史）在微观上与研究实物亦即“实质之营造”相联系，在宏观上与“全部文化史”结合，并提出要重视中外文化交流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纵剖”和“横断”两方面的工作方针。他指出，“纵剖”即“有史以来，关于营造之史迹是也”，即在文化史——包括政治史、文化史、经济史、工程技术史等多方面的基础上，进行建筑通史研究。“横断”则指地域间的横向联系和影响，他指出：“凡一种文化，决非突然崛起而为一民族所私有。其左右前后，有相依倚者，有相因袭者，有相假借者……学者循其委以竟其原……而人类全体活动之痕迹显然可寻。”这里所指虽侧重外域交流，但我国是地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也同等适用于国内的地域文化间和各民族文化间的交流和影响，并体现在以后营造学社的研究工作中。最后他总结说：“有纵断之法以究时代之升降，有横断之法以究地域之交通，综斯二者以观，而其全庶乎可窥矣。”并说“综以上诸说，本社……今后进行之准则差具梗概”。这表明桂辛先生在创建营造学社之始，已经找到了一个正确的研究方向并制定了相应的工作准则。

在工作方法上，先生最初重视文献和理论与实际结合。在《营造学社开会词》中，他提出以前以为“营造学之精要，几有不能求之书册，而必须求之（工匠）口耳相传之技术者……自李氏书出，吾人然后知尚有居乎两端之中，为之沟通媒介者在。”这“沟通媒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能与工匠结合的知识分子。故他非常赞赏李诫编《营造法式》时“一洗道器分途、重士轻工之锢习……与造作工匠详悉讲究，勒为法式”的做法，主张营造学社的工作要抢救和记录工匠的口传知识，加以整理研究，与文献比较，形成专著，把前人建筑经验保存下来，流传后世。当时收集了大量这方面资料，并加以整理，梁思成先生在1932年3月完成的《清式营造则例》就是按这种设想在《工部工程做法》的基础上并综括老工匠的口述经验完成的。桂辛先生自己也曾对《营造法式》作过批注¹。

早在营造学社成立时，桂辛先生已提出“方今世界大同，物质演进，兹事体大，非依科学之眼光，作有系统之研究，不能与世界科技名家公开讨论。”认识到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进行研究之必要。成立之初的二三年间，在文献研究和法式校勘上取得了明显成就。这时日本学者关野贞博士来京与桂辛先生商讨合作事宜，提出由营造学社负责文献研究，由日方负责实物调查测绘与研究，同时示以独乐寺观音阁与应县木塔的照片，在盛赞这些建筑的同时，说恐只有日方才有能力和经验进行如此巨大的测绘和研究工作。此事对桂辛先生刺激颇大，使他深感现存大量建筑遗产之珍贵，决心引进人才，



自力进行实物之调查研究，使文献、法式的研究建立在历代建筑实物的基础上。他把这些照片给梁思成先生看，征询他的意见，梁先生认为完全可以自力进行，遂于1932年4月赴蓟县实测，归后完成了精确的实测图及调查报告。报告中除常规的结合文献、碑记对阁及山门的历史沿革进行考证外，最重要的是把各部件的实际测量与《营造法式》所载相对照，对构件名称、构架特点、细部做法、艺术手法、发展脉络等方面逐一进行名词考定，并对材分数字作分析比较，既深化了对《营造法式》的认识，也开始发现宋、辽建筑间的差异，形成了一篇实物与理论相结合的高水平研究论文，并为以后调查实测和研究古建筑提供了范式。就实物与理论、文献的结合而言，此文已超过了当时日本方面对其本国古建筑研究的深度。在此文发表后，日本方面即不再提双方合作由他们负责实物调查研究的建议了²。此事使桂辛先生了解到必须有精通现代建筑学并对文史方面也有较深素养的专门人从事此工作，才能使研究工作达到世界水平，亦即达到他所说的“与世界科技名家公开讨论”的程度，而对《营造法式》、《工部工程做法》的研究也只有与实物互证，才能取得深入的认识。为此，他特聘梁思成先生和刘敦桢先生全面主持营造学社的研究工作。梁先生主持法式部，随后进行了一系列古建筑调查研究，并专力进行《营造法式》研究。刘先生主持文献部，除调查研究了北京智化寺，为调查研究明清建筑树立了范式外，更在文献考证上作出卓越成就，他的代表性成果《大壮室笔记》在现代建筑学及深厚的古文献基础上考证汉代宫室，精密入微，发前人所未发，决非一般文史考证所能及。梁、刘二位先生的工作体现了桂辛先生提出的纵断、横断的要求和把具体建筑的研究与文化史联系的设想，故桂辛先生对梁、刘二位先生的工作非常满意，在他的《自撰年谱》中说：“得梁思成、刘士能（敦桢）两教授加入学社研究，从事论著，吾道始行。”这有力地证明了桂辛先生的正确决策和知人善任。

自1932年至1937年上半年的五年半时间，是在桂辛先生领导下的中国营造学社工作最勤奋、取得成果最丰硕的时期。其间梁思成、刘敦桢二位先生或分进、或合力，调查了河北、河南、山西、山东、江苏、浙江等地以及大同、五台、苏州等处的大量古建筑，其间发现了日本学者目睹、拍照、出版却仍不能确认的唐代建筑佛光寺大殿³，精测了现存世界最高、最复杂的木构建筑佛宫寺木塔，这些都是我国古建筑中的瑰宝。当时的研究工作除建筑外，还涉及水利和桥梁，除收集整理大量有关文献、典籍外，梁先生的赵州大石桥研究和刘先生的石轴柱桥研究也都是桥梁史研究的开创性成果。营造学社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抢救性地调查了大量古代建筑并基本理清了自唐至清建筑的演进和发展脉络，这是营造学社在学术上和文物保护上的巨大历史性贡献，而这些也都是在桂辛先生的正确指导、知人善任和在财力、人力上的

2 此事曾先后听梁思成先生、莫宗江先生、陈明达先生对我讲过。

3 (日)关野贞、常盘大定撰12卷本《支那文化史迹》，其中收入五台山佛光寺大殿照片，却不能知其为唐代建筑。



4 此事是听张镠先生对我讲的。张镠先生并撰有专文《故宫及北京中轴线文物建筑测绘回忆》谈此事，其中一节题为“朱桂老的启发和忧虑给我动力。”载《紫禁城建筑研究与保护—故宫博物院建院七十年回顾》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版。

5 编者注：此图册已于2004年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书名：《北京中轴线建筑实测图典》。

大力支持下取得的。

抗战开始后，营造学社的主力南迁，先后在云南、四川等地艰苦地开展工作。桂辛先生虽困处敌后，但他仍在很困难的情况下主持了两件很重要的大事。其一是营造学社的大部分图纸、资料、底片等自抗战起即寄存于天津银行库中，却不幸在1938年天津大水灾中遭到浸泡。于是桂辛先生命人进行紧急抢救、晾晒、清理，把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为建国后展开文物保护工作和建筑历史研究工作保存下珍贵的基础学术资料，其中一些实物毁于战争，已成为不可再得的珍贵史料。其二是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必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桂辛先生和几位忧国之士担心日寇败亡时会破坏北京城，特别是紫禁城宫殿，遂决定利用一笔特定的资金进行测绘，万一受到破坏，还可据以修复。当时营造学社骨干远在四川，无法参加此事，恰好建筑大师、人民大会堂的主要设计者张镠先生自重庆来北京主持基泰工程司的工作，并在天津工商学院建筑系授课。张镠先生是梁思成先生的首批弟子，且精通清式建筑，恰是最佳人选。桂辛先生在与他谈及此工作的重大意义后，张镠先生遂毅然允诺承担，组织了天津工商学院建筑、土木两系学生利用寒暑假时期测绘，历时近四年，到1944年初，在很艰苦的条件下，按照基本可据以修复的要求，精密测量了南起前门，北至钟楼，包括天安门、端门、紫禁城四门、角楼、三大殿、钦安殿、鼓楼等北京中轴线上的最主要建筑和太庙、社稷坛两组建筑群，制成数百幅精测图纸，为祖国最重要的建筑遗产留下精密的记录，迄今仍是这方面最基础的资料⁴。这也是桂辛先生晚年对保存古代文化遗产所作的又一重要贡献⁵。

建国以来，国家重视历史文化遗迹的保护，在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收入的大量古建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中国营造学社发现的。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古建筑的保护更为重视，其中一些已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我国人民引以为荣的历史成就和全人类的共同文化珍品。饮水思源，此时回忆起当年桂辛先生在旧社会艰难的历史条件下对阐扬和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热情、在学术上的远见卓识和在他领导下的营造学社诸位先生对研究和保存大量历史建筑遗产所建立的功绩，更使我们对他产生深深的怀念和敬意。

傅熹年

2004年9月21日

（原载《朱启铃学术演论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

附：

朱启钤与古建筑研究

编者按：为了使读者能够全面了解朱启钤的生平业绩，特将杨永生此文附于此。

在 20 世纪初，报刊上常常能见到朱启钤的大名，人们都知道他；在 20 世纪中期，他的名字在报刊上消失了，有谁还记得他？又有谁知道他？在 20 世纪后期，只是在建筑学术刊物中偶而能见到他的名字，在建筑学界也只有少数人像见到出土文物一样惊奇地发现原来我国还有这么一位古建筑研究泰斗。

这是为什么？

他在 1912—1916 年四年间，先后担任过北洋政府的交通部总长、内务部总长以及代总理。这也不要紧，重要的是袁世凯复辟帝制，朱启钤参与其活动，并担任袁世凯登基大典筹备处处长，因此曾被通缉。

此后，朱启钤即脱离政界，开始经营山东峰县中兴煤矿公司，从事北戴河开发事业，并于 1925 年个人出资创立营造学会，正式启动中国古代营造历史的研究工作。遂于 1928 年在北京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举办古建筑展览会，展示历年搜集到的古建图书、图纸、模型等，大获成功，引起社会各界开始关注中国古代建筑。

趁热打铁，1929 年获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资金赞助，随即于 1930 年正式创办中国营造学社，并自任社长。

我国这个惟一的民间古建筑研究学术团体，自 1930 年成立至 1946 年正式解散，除去抗战期间，少数几个人（主要是梁思成、林徽因以及刘敦桢）辗转大后方，勉强维持研究工作之外，它开展实物调查及文献研究工作，实际上只有七年时间。在 1930—1937 年这七年内，在朱启钤社长的正确领导下，经梁思成和刘敦桢两位建筑专家具体操作，营造学社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确实作出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至今）的非凡贡献和成就。下面一些具体资料即足以说明。

学社职员人数最多时是 1934—1937 年间，每年有 17 人，最少时是 1938—1939 年和 1945 年只有 5 人。

截至 1937 年，总共调查古代建筑达 2700 余处，其中实地测绘重要古建筑达 206 组。



1 梁思成致朱启铃祝寿信:

一九三一年, 初随

桂师治我国古代营造之学, 悠忽卅载, 解放以来, 百废俱兴; 建筑事业百花齐放, 推陈出新, 卓有成绩。辛丑初冬, 欣逢

师九秩大庆, 谨奉此册(即《建筑十年》画册——杨永生注), 祝

杖履康健, 松柏长寿, 谆谆不倦, 教我后学。

弟子: 梁思成 敬祝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2 刘敦桢致朱启铃祝寿信:

桂师尊鉴前奉寸柬计达

座右回忆民国初季

先生发现营造法式抄本究心宋法式与清做法进而组织营造学社以完成中国建筑史勉励后进培养人才今日建筑学术界在党领导下蓬蓬勃勃一日千里然当年

先生筚路蓝缕之功固亦垂诸不朽敦桢亲聆

教益三十余年于兹受惠之深赅墨难罄际此

九秩大庆理应赴京祝嘏乃疾病纠缠不克北上而朱君鸣泉来信云苏州倩影不能如期付邮下怀尤为不安谨此专函祝

寿兼述歉忱尚恳

海涵于格外临颖不尽万一专肃敬叩

寿安

门人 刘敦桢 上 陈敬
同叩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3 瞿鸿机(1850-1918年), 曾任清廷工部尚书, 军机大臣兼充政务处大臣, 外务部尚书, 深得慈禧太后信任。

编辑出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共22期, 出版专著达31种。

除了这些可以量化的成就之外, 更加重要的是为我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探索出一整套研究中国古建筑的科学方法; 解读了宋代著名古建专著《营造法式》; 研究了中国古建筑的发展脉络, 为撰写古建筑史构建了科学体系; 培养出世界级的中国古建筑学者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以及刘致平、单士元、莫宗江、陈明达、罗哲文、卢绳、邵力工等。

时至今日, 我们应当说, 朱启铃是中国古建筑研究工作的奠基人、开拓者, 没有任何缘由抹煞他的历史功绩。假如没有这样一位有社会号召力、有学识、又肯于个人出资, 团结社会各界有识之士, 高瞻远瞩, 孜孜以求, 就不可能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像梁思成¹、刘敦桢²这些建筑学界顶级领军人物, 而我们读到中国建筑史的年份也不知道要推迟多少年。

人们不禁要问, 上述历史责任为什么落在朱启铃的双肩上?

朱启铃童年丧父, 随母亲寄居外祖父家, 遂被身居清末朝廷要职的姨夫瞿鸿机³发现其经事之才, 令他随侍左右, 悉心培养, 举荐为官, 并受到徐世昌、袁世凯重用。从而, 清末朱启铃即被委任京师内城及外城巡警厅厅丞, 创办京师警务及市政建设。1929年, 朱启铃说, 他对古建筑发生兴味已有20余年, 这样算起来, 在他任巡警厅厅丞时即已对古建筑发生兴趣, 并已做了许多实地考察。辛亥前后, 又负责筹建山东济口黄河桥工程, 并经办铁路事业达五六年之久。辛亥以后, 他在出任内务部总长期间, 改建北京正阳门, 打通东西长安街, 开放南北池子、南北长街, 修筑环城铁路, 疏浚护城河, 栽植街道两旁行道树, 改造社稷坛为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 开放北京皇家苑囿和名胜, 创办博物馆、传染病院等。这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当时在全国均属首创之举。这些业绩无疑都是他日积月累调查研究城市建设业务所取得的, 同时给他日后研究古建筑打下了业务基础, 也增添了莫大的兴趣。一个人的兴趣, 当然不是从天而降, 而是在生活中培育起来的。

朱启铃的中国文化底蕴深厚, 自不待言, 而他两次出国考察, 对他增长学识、认识西方文化无疑也起到了很大作用。1909年, 曾赴俄罗斯西伯利亚东海滨省及日本北海道访问达半年之久。而后于1921年出使法国, 代表徐世昌接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 并游历英、意、比、德、美、日本六国, 亦达半年之久。

特别是1919年受徐世昌总统之委任赴上海以北方总代表身份参加南北议和会议途经南京时, 在江南图书馆发现(并非偶然, 而是有意查找资料)手抄本宋代李诫著《营造法式》, 经校核于1925年刊行之后, 更加坚定了研究中国古建筑的信心, 并从此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除了上面说到的文化修养、业务修养、个人兴趣之外, 还有一个不可忽



4 由徐特立起草的此感谢信及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收到捐款的签名册，现均保存在南京第二档案馆。

视的要素，那就是个人的魅力。这里，只举一例来说明朱启铃道德文章之高尚。1921年，当他抵达巴黎后，得知我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生活极为艰苦，即捐国币5万元相资助。解放后，大约是1956—1957年间，徐特立曾托章士钊向朱启铃转达谢意。为此，章士钊曾写便笺给朱启铃，现抄录如下：

“兹有二事奉告：一、前日中央委员徐特立来访，称民国11年（按：系民国10年之误）公过巴黎，适值勤工俭学生濒于饥饿，公慨然拨赠国币5万元。谢函乃彼起草，嘱为公追述此事，深致谢意⁴。

二、昨夜毛公（按：指毛泽东）约谈，于公手录鄙文极感兴趣，因详询公之起居各状。倾服之意，溢于言表。对于拙作亦颇称道，迥与外间浮浅议论不同。”

抗战胜利前后，学社人员纷纷离去，经费来源枯竭，在朱启铃社长并不情愿的情况下，于1946年宣告解散，学社资料分给清华大学营建系和文物部门。

然而，学社骨干刘致平教授生前始终坚持要恢复中国营造学社。记得，“文革”期间，刘老曾亲口同我谈起应该恢复营造学社一事。当时，我曾奉劝他，别再提此事。我说，你同我谈，还没啥。若被造反派听到，没准儿又要批斗你。别说营造学社，就连共产党自己办的中国建筑学会都停办了。

现在，事隔40年，有地位的人又有谁会想到要恢复民间学术团体营造学社。也许再过25年，到学社100周年的时候，建筑学界再出一位学术带头人领衔恢复中国营造学社。有人会说，你这是梦想。

但愿这梦想能成真！

杨永生

（原载《建筑创作》杂志2005年第11期）





刘敦桢

(1897—1968)

刘敦桢，字士能，湖南省新宁县人。清光绪二十三年农历八月二十三日（公元1897年9月19日）诞生在一个官宦地主家庭。父亲刘永涛，清末曾一度任江苏省东台县令，母亲李氏，另有兄长敦樸、敦桢二人。新宁县位于省内东南的一个偏僻小县，交通阻塞，物产也不十分丰盛。但在清代晚期，特别是咸丰、同治之际，邑人随湘军外出镇压农民起义，从而发迹扬名官至三品以上者，自刘坤一、刘长祐以下无虑数十百人。以致县中一时冠戴云集、豪宅相望，蔚为地方数百年来未有之盛况。

在这样的社会条件和家庭环境下，刘敦桢从四岁起就接受了系统封建教育，事后他曾回忆，那是一个相当漫长而艰难的历程。虽然对所学的内容不甚了解，但仍需死记硬背。最后得到的效果也并非都是负面的——造就了自己异常良好的记忆力，并培养了对中国文史的巨大兴趣。而那些深刻模印在脑海中的大量知识，对他日后的研究工作也带来极有益的帮助。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叶，正值中华民族外逢帝国主义侵略瓜分，内遭战乱灾荒连年不断，使亿万黎民处于万劫不复和水深火热之中，这就导致要求改变现状、推翻满清王朝腐朽统治的革命活动日益高涨。为了摆脱旧家庭羁绊和接受新思想，已参加同盟会并正积极进行工作的长兄，就带领弟弟来到省会长沙，并将他们送入著名的楚怡学校学习。不同的社会氛围和学习内容使人大开眼界，不久后辛亥革命的成功，更加激发了年轻人的爱国豪情。要为国家民族作什么贡献？三兄弟的选择各不相同：长兄要为未竟的民主主义革命继续奔走，次兄断然选择了“以武振国”而投笔从戎，作为小弟的他则抱着“科学救国”的信念完成自己的学业。并在1913年秋刚满16岁时，考取了赴日本的公费留学。

异国他乡的陌生环境和紧张的学习生活，对体质欠佳和语言不通的他是最大的障碍，为了尽快适应，他强迫自己吞食半生半熟的鱼虾，每天坚持跑



步并学习游泳。此外，又寄居在当地居民家中以学习日语和了解民俗。三年以后，他从一个瘦弱苍白的少年成长为健壮黝黑的小伙子，并在语言和习俗方面基本已融入了这个过去不熟悉的国度。

1916年春，他考入了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今东京工业大学）机械科（即系），第二年因志趣不合转入建筑科，这决定无疑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由现代科学知识组成的建筑学专业，在当时国内尚未建立，回国后的前途自然是风光无限。但为国家民族振兴的责任感却是他最大的动力，为此对各部门课程的学习都十分努力，并一贯取得优异成绩。他在多项体育竞赛（百米短跑、足球、游泳等）中的表现也很突出。日本留学期间，他不但学到了专门的业务知识和技能，锻炼了自己的体魄，同时也对日本民族在工作和生活中勤劳刻苦、认真负责的作风深为感动和钦佩。此外，日本政府和广大民众对传统建筑的高度重视和刻意维护，尤其令他引发深思，这与国内情况对比差距实在太太大。使他领悟到对中国传统建筑的全面保持和科学研究，已经到了刻不容缓和义不容辞的地步了。

1921年大学毕业后，即在池田老师的建筑事务所中工作了一年，并于次年春季回到上海。开始在上海绢丝纺织公司任建筑师，设计了若干纱厂厂房、办公室和小住宅。不久与同窗柳士英等在法租界霞飞路创办了第一家完全由国人经营的华海建筑师事务所，先后设计的项目有商店、里弄住宅、小住宅等。

1923年8月，又与同窗朱士圭、黄祖森、柳士英共建我国第一所中等建筑技术专业——苏州工业专科学校（简称“苏工专”）建筑科，培养了当时国内建筑业急需的技术人才。这时他并未忘记自己的初衷，于是在设计、教学工作之余，遍访南京、上海、杭州一带的古建胜迹，进行了初步的实地踏勘调查。此外，由于一贯热衷运动，他还经常参加在上海举行的足球比赛。1925年6月，他一度返回长沙，并在湖南大学土木系任教。此时曾为湖大设计了两座教学大楼以及城内的名胜天心阁。次年他再返苏州，继续在苏工专授课。经友人介绍，认识了当时执苏州工师牛耳的姚补云老先生。二人竟结为“忘年交”，经常偕同踏访城内及郊区的古建、园林、住宅，相互析疑辩难，切磋研讨。

1927年，我国为了创建第一个高等建筑学专业，调集他和一些留学归来的学者，如刘福泰（留美）、贝寿同（留德）、卢树森（留美）、李毅士（留英）等来到南京，共商建系事宜。其中包括培养目标、学习年限、课程内容等等。由于世界各国对建筑学教育的重点不尽相同，一般说来，法、美比较偏重艺术，而英、德、日则较偏向技术。因此在讨论时，各种观点难于统一。内中最关键的是培养目标，既要达到世界公认的水平，又要符合中国的实际



要求。最后一致认为应着重能够解决当时国内的建筑设计、施工问题，因此要稍多偏重技术方面的内容，学制仍采用四年。这年岁末，他与苏工专建筑科少数教师和高年级全体学生正式并入中央大学工学院建筑系。从此揭开了我国高等建筑教育新的一页。在此后的几年里，他积极协助系主任刘福泰在课程设置和教学、设备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由于当时系中一些教师出于各种原因不能及时来校授课，为了不耽误学生的学业，他不得不经常充当“救火队”，讲授一些原本不属于自己的课程（从设计、结构、测量到施工预算，差不多都涉及到了）。这使他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对系中多数课程的了解也使他得益匪浅，特别是后来担任系主任工作时，然而这乃是当时始料所未及的。

这时他和卢奉璋合组了永宁建筑师事务所，设计有办公楼、住宅等等。1931年又在中山陵前东侧设计并建造了一座仿清式的六角边形石亭——光化亭。这是他以传统建筑手法作出的首次实践。此外，还对栖霞山栖霞寺的南唐舍利石塔进行了复原维修。至于利用假期、外出游览古迹和周末去上海踢球，也一直没有间断过。

早在1928年，他就发表了首篇研讨中国古建筑的论文《佛教对中国建筑的影响》。两年后，他加入了当时国内惟一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同年7月，他率领中大建筑系部分教师及高年级学生一行十人，前赴山东、河北及北平等地参观具有代表性的古建筑，如山东曲阜孔庙、颜庙、孔林，河北昌平明十三陵，北平故宫、天坛、颐和园等。途中不但长途步行，而且还坐过运输碎石的货车。这也是国人对我国古代建筑最早进行的一次团体教学考察活动。

他于1930年冬在长沙和毕业于湖南大学中国文学系的陈敬女士结为连理（陈氏是长沙的望族，陈敬的祖父陈佩珩曾入宦途，后从事实业，曾经开过煤矿，建造株洲至萍乡铁路，又创立长沙电灯公司，当时在产业实力上居全湘之首。父亲陈模，是清华学堂首期留美学生，后任教于湖南大学经济系）。婚后即来南京，住在离中大不远的唱经楼。

1931年他翻译了日本学者滨田耕作《法隆寺与汉、六朝建筑式样之关系》及田边泰《“玉虫厨子”之建筑价值》二文，并作了大量订正及补充，均发表于次年3月出版之《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以下简称“汇刊”）三卷一期。其精辟论述引起了学社朱启钤社长的极大注意，遂邀请他前往北平参加学社的专门研究工作。这是决定他今后人生道路非同小可的大事，虽然十分符合他的夙愿，但为此要放弃的实在太多：正教授的职位，建筑师的业务，每月超过五百大洋的固定收入，熟悉的工作环境和江南舒适的生活……收入减少一半以上，固然是重大损失，但最关键的还是对未来的工作情况和前途吉凶

